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丛书

杨思远 主编

蒙古族经济史

下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丛书

杨思远 主编

蒙古族经济史

下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下 卷

第四篇 清代蒙古族经济史	韩 强 (515)
第十六章 满族对蒙古族的经济统治 (517)	
第一节 满族征服蒙古族的经济根源	(517)
第二节 满族对蒙古族的经济政策	(526)
第三节 蒙古族土地关系变迁与集权官僚制经济确立 ..	(537)
第十七章 盟旗制度下的蒙古族畜牧业 (541)	
第一节 “分而治之”	(541)
第二节 牧主成为新兴阶级	(549)
第三节 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导致牧民负担沉重	(556)
第十八章 清代汉族移民对蒙古族经济的影响 (567)	
第一节 由“明禁暗放”到“禁而不绝”	(567)
第二节 半农半牧区、农业区的出现	(572)
第三节 土地公共占有制向私人占有制转变	(579)
第四节 蒙古族商业、手工业和城镇的兴盛	(587)

第十九章 清代蒙古族寺院经济	(594)
第一节 寺院经济兴盛的原因	(595)
第二节 寺院经济畸形发展	(601)
第三节 寺院经济的衰落	(611)
第二十章 清代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经济关系	(620)
第一节 与满族的“通贡”、赏赐与联姻	(621)
第二节 蒙汉互市与通商	(629)
第三节 新疆、青海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经济关系	(635)
第四节 蒙古族对俄贸易	(640)
 第五篇 晚清至民国蒙古族经济史	李 静 (645)
 第二十一章 帝国主义列强对蒙古族的经济侵略与满蒙 “新政”	(647)
第一节 沙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对蒙古族的经济侵略	(649)
第二节 帝国主义列强对蒙古族经济掠夺的多种方式	(656)
第三节 洋教对蒙古族的经济侵略	(665)
第四节 清政府对蒙古族的“新政”	(673)
第五节 蒙古族人民反帝、反官僚、抗垦、抗租斗争	(686)
第二十二章 晚清蒙古族经济从集权官僚制到半殖民地 半官僚制的转变	(694)
第一节 晚清蒙古族社会性质与经济、政治制度变迁	(694)
第二节 晚清蒙古族人口的缓慢增长	(699)
第三节 晚清蒙古族畜牧业由盛转衰	(708)
第四节 晚清蒙古族农业经济的进步	(721)
第五节 晚清蒙古族手工业和商业的畸形繁荣	(729)
第六节 晚清蒙古族混乱的货币制度	(737)

第二十三章	民国时期多个反动政权对蒙古族的经济剥削	… (747)
第一节	北洋政府的治蒙政策与蒙垦	… (749)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进一步蒙垦与蒙古族牧民反垦	… (961)
第三节	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	… (766)
第四节	日本伪满兴安政权对蒙古族的经济掠夺	… (777)
第五节	日本伪蒙疆政权对蒙古族的殖民统治	… (787)
第二十四章	民国时期殖民和半殖民化的蒙古族经济	… (798)
第一节	民国时期蒙古族人口的不平衡增长	… (798)
第二节	民国时期畜牧业的继续衰退与技术改良	… (807)
第三节	蒙古族农业的“破坏性增长”	… (814)
第四节	民国时期蒙古族工商业的殖民地化	… (819)
第五节	民国时期蒙古族金融业的新旧交替	… (824)
第二十五章	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蒙古族新民主主义经济	… (833)
第一节	共产党领导下的蒙古族解放事业	… (833)
第二节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财政与金融	… (839)
第三节	蒙古族民主改革与货币统一	… (847)
第二十六章	晚清至民国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经济关系	… (853)
第一节	蒙满经济关系的弱化与破裂	… (853)
第二节	蒙汉经济由隔离走向融合	… (857)
第三节	蒙古族与藏、维及外国民族的经济关系	… (863)
参考文献	…	(870)

• 下 卷 •

第四篇

清代蒙古族经济史

韩 强

第十六章

满族对蒙古族的经济统治

有清一代，满蒙一家，主次有别。自女真东起，满洲贵族便极力拉近与蒙古族各部的关系，并最终联合蒙古族势力入主中原，问鼎天下，蒙古族各部亦成为其藩属臣民。蒙古族各部被迫臣服的原因，主要在于其经济上的衰弱和满洲的极力诱惑。清廷通过设立理藩院（初为蒙古衙门）和推行封禁政策等措施，加强对蒙古族的经济统治，沿袭千年之久的封建领主制经济易位于集权官僚制经济，蒙古族世代相传的游牧业在发展方式上有了质的变革。

第一节 满族征服蒙古族的经济根源

按辩证法来讲，矛盾的发展不外乎两个原因：内因、外因，其中，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蒙古族各部沦为满洲的藩属，根本原因在于各部经济实力衰落，各自为政，无心反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软弱，则政治无力。满洲通过利益引诱和政治联姻，极力拉拢蒙古族各部，最终征服之。

一 蒙古族畜牧业衰落

蒙古族自古以游牧为生，畜牧业是其经济生活的支柱，是维持民族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根基，是蒙古族自立于世的显著标志。如果没有强盛的经济实力，成吉思汗不可能征战欧亚大陆，同样，如果蒙古族畜牧业一直欣欣向荣，则蒙古族不会在政治格局变换中处于下风：在明代受明王朝节制，而终清一代，又附属于清王朝。蒙古族畜牧业的衰落，成为满族征服蒙古族的主要原因。

盛世不再，屈复故地。元末统治黑暗，君民离心，蒙古族建立的第一个王朝终被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推翻，元室北迁，重归祖地。从此，蒙古族重新进入分裂、动荡时期。明王朝采取“以蒙治蒙”的政策，旨在煽动蒙古族各部“各相为战”，时而支持瓦剌攻伐东部蒙古，时而鼓动东部蒙古削弱瓦剌，而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任凭蒙古族经济衰弱，民生凋敝。^① 虽然后期蒙古族出现过短暂的、局部的统一，但这种局面很快消失。蒙古族各部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征伐不断，加之与明王朝的冲突始而未决，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战争中。虽然蒙古族畜牧业在这一阶段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相对连绵不绝、残酷苛刻的封建剥削，甚至出现了倒退迹象。进入17世纪，作为黄金家族嫡系大汗、统领察哈尔部的林丹汗，为了统一蒙古族，与明王朝的矛盾冲突减少。明王朝也急于联合林丹汗，共同抵御后金。故林丹汗依恃明王朝对各部横加兵威，所以各部便起而对抗林丹汗。时间跨度长、空间范围广的蒙古族混战就此开始。此番蒙古族的各部纷争与成吉思汗之统一蒙古完全不同：成吉思汗统

^① 详见晓月《漠南蒙古归附后金经济原因管窥》，《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一蒙古族，结束了蒙古族聚居区分裂、混乱的局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由林丹汗发起的对蒙古族各部的讨伐，则是倒退的、落后的，林丹汗妄图重举霸业，但却忽视了最根本的元素：财力来自明王朝，而非自力更生。明王朝绝不可能希冀蒙古族东山再起，与后金一起威胁自己的统治。经过长时间的纷争，蒙古族各部损失惨重。而明王朝和满洲不费一兵一卒，坐视蒙古族各部逐渐衰敝不堪。当力不能抵时，蒙古族各部纷纷离弃甚至背叛林丹汗。这样，蒙古族势力的削弱，不只是外部，而更多的是因内部的割据、战乱，乃致造成分崩离析。^① 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团结奋进，才会经济强大，只有繁荣发展，才可自立自强。明末清初的蒙古族，缺乏统一的发展纲领，各自为政，拘泥于传统的游牧经济而不知变革，经济衰微，势必依附满洲。

二 蒙古族各部经济独立

自元室北迁蒙古高原之后，蒙古族各部便出现了分化的趋势。至明末，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各部均各自为政，割据一方，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族部落经济雄厚的实力便被分裂的政权形式所溶解。经济的独立，尤其是传统的游牧经济的独立，给外来势力创造了征服蒙古族聚居区的机会。此时的蒙古族聚居区，三面临敌：沙俄欲吞并漠北蒙古而频频试探其政治倾向；明王朝希望联合蒙古诸部抵御后金；后金觊觎蒙古族聚居区已久，意欲并而用之。

后金铁骑不断西进，严重威胁到明王朝北部边疆的安宁，城池失陷，百姓流离失所。为此，明王朝逐渐关停与蒙古族聚居区的互

^① 白凤岐：《试析明末清初满族、蒙古族关系史上的因果性》，《满族研究》1990年第1期。

市关口，以防范后金的进犯。随着蒙古族聚居区与明王朝互市的停止，蒙古族各部失去了以往从内地换得的部分生产生活用品，严重影响到游牧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蒙古族各部单凭自己的实力而延续各自的封建统治，着实困难，于是，进一步的分化过程油然开始：以察哈尔林丹汗为首的蒙古族贵族上层的一部分人物，继续依靠明王朝，企盼明王朝的市赏；以科尔沁鄂巴为首的另一部分蒙古族贵族上层则投靠了后金。^① 蒙古族世代以传统的游牧业作为支柱产业，经济结构极为单一，且传统的游牧经济抗风险能力低下，遇有恶劣自然灾害或者其他外部损害，都会对经济造成极为消极的影响。蒙古族的传统游牧业与内地传统的小农经济有相似之处，二者在发展模式上皆为自给自足型，但一般情况下，小农经济可以实现完全的自足，农民在衣、食、住、行方面都可以不借助于外力，即可自行生产；传统的游牧业虽然可以解决牧民大部分的衣食之需，但牧民仍需要内地的物资补充生活用品的欠缺，这也就决定了蒙古族各部落在经济上的劣势。此外，蒙古族各部规模大小不一，有的较小的部落仅有七八百人口，二三百户，如此经济规模，怎可有真正独立于世的能力。圣主成吉思汗时期，如若不是统一蒙古族聚居区各部，使各部经济实力合为一体，霸业恐亦难成，百万铁骑，耗资巨大，非一二部落可以承受。明末清初这一阶段，蒙古族外有列敌，内部分裂，成为清王朝的藩属，并非偶然。

三 与明廷经济关系恶化

(一) 明廷赏赐为林丹汗独揽

元室北迁之后，与明王朝一直处于时战时和状态。明王朝为了

^① 阎光亮：《清代内蒙古东三盟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巩固北部边疆的安宁，除了定期与蒙古族各部开展互市贸易外，还会赠予一定的岁币，以安抚蒙古族各部。后金的崛起，严重威胁到明王朝的统治。为了扼制异族势力的兴起，明王朝统治者只能联合与满洲毗邻的蒙古族，以为反满联盟。明末，蒙古族聚居区实无共主，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以成吉思汗皇室嫡裔自居，在名义上代表蒙古族聚居区。明王朝与林丹汗相约，共同抵御后金。但条件是：明王朝必须增加每年赠予林丹汗的岁币，岁币数额达到4万两之多；并且将原由明王朝直接赠予漠南东部蒙古族诸部的岁币统统撤销，转交林丹汗控制。^① 以1629年为例，明朝给察哈尔林丹汗两年辽东赏银40万两，两年大同赏银24万两，两年山西赏银10万两，宣府赏银18万两，新赏81000两，计银约百万两。其中大部分是马市银两，即市本。^② 由此，漠南东部蒙古族诸部主要的外部收入被林丹汗截获，严重影响到这些部落的对外交换，给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不便。由此，东部蒙古族各部与察哈尔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冲突在所难免。

（二）贸易关市停办

俄国著名的蒙古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曾说过：“对汉人文化产品，主要是食品、织物以及金属制品的需要，推动蒙古从掠夺和袭击转向与明朝建立贸易关系。”^③ 中原和漠南正常的经济交往由来已久，主要是贸易互市的形式。通过贸易关市的定期抑或不定期的开办，蒙古人可以用牛、羊、马等牲畜或者畜产品换得粮食、食盐、

^① 详见《蒙古族简史》编写组《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页。

^② 达力扎布：《蒙古史纲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③ [俄] 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1页。

布匹、茶叶、铁器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弥补游牧经济的欠缺。然而，明末清初，随着后金势力的崛起，其与明王朝的军事斗争愈演愈烈，努尔哈赤的八旗兵沿长城一带不断向西推进，致使张家口、杀虎口等明蒙互市关口被迫关闭。互市的消失，对内地汉人的影响也许并不显著，但对于蒙古族贵族和普通牧民则是沉重的打击，严重威胁到他们的正常生活。当时，蒙古人如若想获取外部供给，只有两条途径：一为传统的进攻明边，一为索取市赏。但军事进攻必然要损失生产力——人员，得市赏则要承担对方附加的政治条件，即与明王朝联手钳制满洲势力。这些因素反过来又导致蒙古族社会经济的恶性循环。^①

及至明王朝的赏赐绝无，互市匿迹，蒙古族各部开始寻找新的经济依靠。当时，蒙古族所需物资，除中原可给外，只有满洲。满洲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励精图治下，农业发展迅速，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加之满洲军队在征战过程中掳掠了大量的财富，使满洲成为当时东亚的后起之秀，在经济方面仅次于明王朝，与高丽等国家或部落也有着较为密切的经济往来。蒙古族各部大部分以前皆与满洲交恶，但单一的游牧经济结构和游牧业抗风险能力低下的现实，迫使蒙古族各部逐渐与满洲遣使示好，希冀满洲可以代替明王朝，成为蒙古族各部新的稀缺物资提供者。^②满洲执意消灭明王朝，入主中原，但苦于自身实力暂时弱于敌方，见蒙古族各部有意与之通好，自喜不待言。由此，蒙古族大部分封建主归附满洲。经济依靠，军事协助，文化互通。

^① 阎光亮：《清代内蒙古东三盟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晓月：《漠南蒙古归附后金经济原因管窥》，《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 年第 3 期，第 79—81 页。

四 满洲极力拉拢蒙古族各部

(一) 馈赠物品

拉拢蒙古族贵族上层，馈赠其大量物品，一直是满洲对蒙的重要策略和手段。在《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等重要史料中，随处可见满洲皇帝赏赐蒙古族贵族的记载。此处仅略列一二。太宗朝天聪七年（1633年），“庚戌，遣达尔汉台吉妻归国，赐甲胄、雕鞍、缎布、银器、女朝衣等物”。^① 1621年，喀尔喀台吉古尔布什与台吉莽果尔率所属600户以及牲畜归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赏给他们：各赐裘一、貂三、猞猁狲、虎、貉皆二、狐一；缘貂朝衣五、缘獭裘二、缘青鼠裘三、蟒衣九、蟒缎六、缎三十五、布五百、黄金十两、白银五百两、雕鞍一、鲨鞍七、玲珑撒袋一、撒袋实弓矢八、甲胄十、僮仆、牛马、田宅、杂具毕备。^② 从这两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满洲对蒙古族贵族的赏赐，以绸缎、华服、金银等蒙古族聚居区稀罕之物为主，这些物品可以满足蒙古族贵族的生活需求，彰显身份。

满洲不仅对自愿归附的部落给予额度不等的奖赏，对以往与满洲敌对的蒙古族王公，如若遣使通好，也一视同仁，照例赏赐绸缎、粮食、金银、人口等。蒙古族各部所贡财物，皆以牛、羊、马、驼为主，满洲皇帝一律“酌纳之”，更加易于俘获蒙古族各部的人心。满洲通过对蒙古族各部的丰厚赏赐，使蒙古族各部感恩戴德，眷顾天恩，在意识上自然而然地开始倾向于满洲皇帝，而对蒙古族的

^① 《清太宗实录》，卷13。

^② 宝玉柱：《清代蒙古族社会转型及语言教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共主”林丹汗越来越疏远。

(二) 满蒙联姻

封建统治者擅于利用各种形式加强与邻邦的往来，贵族之间的联姻作为主要形式，尤为明显。比较有代表性的朝代，如汉代、唐代等，都通过贵族宗室之女远嫁邻邦，以达到拉拢的目的。特别是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加快了内地与青藏高原的交流，成为传世佳话。后金统治者深谙此理，联姻“战术”之运用得心应手，与蒙古族各部的联姻效果显著，为后起的偏远部落赢得了入主中原的先机。

有清一代，十二朝皇后有6人出于蒙古族，且大都为成吉思汗后裔博尔济锦氏；皇妃中出于蒙古族者为16人。清王朝前期，满洲公主和亲蒙古族各部者达23人，^① 其中，天聪至顺治年间为12人，中又有八人为蒙古族后妃所出，可见当时的满蒙联姻强度之大。满蒙联姻始于清太祖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为建立女真与蒙古族的亲善关系，主动提出愿纳蒙古族贵族之女为妃，根据历史记载，1612年，努尔哈赤以“闻蒙古科尔沁贝勒之女甚贤，遣使往聘”^②。明安贝勒将女儿许配给努尔哈赤，由此揭开了满蒙联姻的大幕。科尔沁部是满洲联姻的主要对象，太宗皇帝的孝端皇后和孝庄皇后皆出自科尔沁部，因此，科尔沁亲王的级别和俸禄都远高于其他蒙古族亲王。通过联姻拉拢蒙古族各部，是满洲怀柔政策的一个方面。大规模、长跨度的贵族联姻，拉近了满蒙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舅甥关系网络，为满洲扩张势力埋下了深厚的伏笔。此外，满洲公主下嫁，势必有大量的人员、金、银、牛、马等陪嫁品，公主、额驸

^① 金启荪：《清代蒙古史札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105页。

^② 《东华录》，明万历四十年春正月。